

10月18日,9岁男孩小乐随姥爷到河南平顶山市一动物园游玩,被黑熊咬断右臂。据《大河报》等媒体报道,事发时男孩自行翻越护栏到熊舍前喂食黑熊,黑熊通过破损的防护网咬断男孩右臂。目前,小乐已完成截肢手术。

发生这样的事情显然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这对小朋友和他们的监护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惨痛的警醒,动物园虽然是孩子们亲近自然和动物的好去处,但那些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尤其是有较强攻击性的动物,显然需要“敬而远之”。随意翻越护栏、喂食或者向动物投掷物品,是极其危险的。孩子不懂事,家长却须格外注意和叮嘱,动物园也须尽到完全的注意和保护之责,别等惨剧发生才想起“补牢”老化的防护网。

据《现代快报》报道,近日,江苏徐州警方通报了一起抢劫案件——听到有人大喊“抢劫”后,徐州一群广场舞大妈仗义出手,追得两名劫匪四处逃窜,最后躲进居民楼内不敢出来。大妈们则把守住楼道口,等着民警前来“瓮中捉鳖”。

“中国大妈”,或许渐渐成为了一种身份标签,但更多的时候恐怕不是一种溢美之词。此番事件提供给我们一种重新认识大妈的视角——“危难”之时,大妈可以很威武神勇,日常琐事,大妈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下一次,当我们再不满大妈们的所为时,不妨想想今天她们的善良和可爱。然后,我们可以更心平气和地跟大妈们商量,广场舞到底该怎么跳。

据《新京报》报道,近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向社会发出“饥饿24小时全民公益活动”倡议书,邀请参与者24小时不进食体验饥饿,以表达对贫困弱势群体的关注。该活动引发众多争议,有人称此举为“作秀”,也有专家表示,“饥饿24小时”公益项目很有创意,沉重的话题做得轻巧,值得提倡。

仔细看倡议书,并非要强迫谁参与饥饿体验。模仿“冰桶”也罢,“作秀”也罢,指责、嘲讽总是容易的。在监督公益组织运行规范透明之际,让我们对公益之事多一份关注,多一份参与,会更有助于公益事业的未来。

号”的方式。人们热衷于此,跑的当然是健康,是全民健身。如果我们只能在雾霾里奔跑,不仅北马这项赛事的魅力会大减,跑步都将不再是健康的追求。

为了健康,我们选择奔跑;为了健康,我们谈论雾霾。

站在这个角度,当我们跑马拉松时我们在谈论雾霾,倒不算离题。去年的北马“屎红墙”讨论,让“屎红墙”很快成为历史;今年的北马“雾霾跑”,能否加快赶走雾霾的速度呢?

马拉松精神的内涵是挑战自我、超越极限、坚韧不拔、永不放弃。治理雾霾正需要这样的马拉松精神,坚毅并且持之以恒。

6 新闻观察

# 给每条“断头路”列出责任清单

□本报评论员 康 劲

查所见令人担忧:从河北通往京津两地的“断头路”总里程达2300公里,北京两条跨区南北主干路“断头”7年,昆明市教场西路延伸到中环路的“断头路”5年未竣工、兰州两条“断头路”背后都有一本“糊涂账”……

“断头路”的出现,实质是一些地方行政效能、行政责任的“断头”,是政府公信力、执行力的“断头”。当每一条道路建设的决策程序都有案可查,每一位相关责任人都清晰可见,每一笔资金筹措与使用都公开透明,每一处的失利失误都有可启动的问责追查机制,我们相信,“断头路”会少一些。

上周,本报多路记者在兰州、昆明、成都、北京等地调查“断头路”状况及原因,调

不畅,拆迁安置受阻,项目资金不到位,规划和施工单位各行其政,等等。但在这些“原因和理由”的背后,公众却看不到一份清晰的“责任清单”,找不到究竟谁该为“断头路”负责。

决策有程序、执行有监督、完成有考核、失职有追责,这是基本的行政管理常识。而“断头路”现象反映出的则是这种常识的“断头”。

不论是区域间的路网建设,还是城市道路的建设,在立项、规划、报建之初,都应是经过政府相关部门科学严格的论证,何时开工、何时建成投运,都应有清晰的任务书和时间表。同时,作为基础设施的公共道路,大都是依靠政府的投资或融资,如果是动用财政资金,应该有严格的预算、执行、审计和决算;即便是社会募集的资金或是银行贷款,也有着非常严格的法定规范。但当前的问题

是,公众无缘见到政府有关部门修路的任务书和时间表,不知道一条路怎么修、何时会修好。

多数时候是这样,开工时轰轰烈烈,有人出面热闹闹剪彩,而工程遇到困难时,不见有人出面负责,甚至公众根本不知道该找谁来负责。许多地方的路修到一半,工人散了,没有部门出面解释,没有人告知继续施工的时间。特别是城市道路建设所涉及的资金问题,往往是“一路雾水”,公众不知钱从何来,更不可能知道资金链断在何处。说修就修,说停就停,随意而为,“烂尾路”、“断头路”不时出现。

如此看来,“断头路”的出现,实质是一些地方行政效能、行政责任的“断头”,是政府公信力、执行力的“断头”。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致辞时,用“三张清单”——

“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详细解释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思路,引发社会热烈关注。如果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是政府的“权力清单”,“法无禁止皆可为”是政府的“负面清单”,那么,“法定责任必须为”就是政府的“责任清单”。

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授之有据、行之有规、错之有责”。假如公众总是看不到清晰的“责任清单”,针对权力运行的问责机制总差“最后一公里”,那么,又靠什么来打通各地的“断头路”?

给每一条“断头路”都列出清晰的责任清单,让公众看到任务书、时间表,可谓当务之急。当每一条道路建设的决策程序都有案可查,每一位相关责任人都清晰可见,每一笔资金筹措与使用都公开透明,每一处的失利失误都有可启动的问责追查机制,我们相信,“断头路”会少一些。

## “以权代法”的企业改制留下深刻警示

□吴杭民

据10月1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9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原市委书记杨信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检部门立案调查,这让当地百姓想起之前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并“失联”的女富豪刘迎霞。地级市高官与“最美政协委员”到底有着怎样的利益交集?记者调查发现,杨信在任时,刘迎霞强行收购齐齐哈尔自来水公司案的背后,是个别官员打着改革的幌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这种不履行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以权压法、以权代法的行为,不仅酿成难解的后患,也留下深刻的教训和警示。

于法无据成敗局,以权代法留后患。很多深刻的教训都在告诫我们,不在法治框架下的企业改革,往往会留下重重遗患,甚至影响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和信心。

在国企改制拉开帷幕的当下,我们该如何杜绝此类以权压法、以权代法的猫腻呢?

只有把权力关进严密的“笼子”,在改革的事先、事中、事后设定强有力的监管程序,才能避免国有资产被少数人瓜分,杜绝打着改革的幌子却为个别人谋取私利的行径。

### 6 新闻观察



“脸面”

湖北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10月19日通报,日前一环卫工人在制止车窗抛物时,被一坐在宝马轿车里的男子连扇两耳光,且男子声称“不怕你报警”。环卫女工面部红肿,向警方报案,“我只想为环卫工人讨回公道,不能打了环卫工就算了。希望通过这件事,让市民更理解环卫工作。”武汉城管委向女工颁发了1000元“委屈奖”。

打人者“不怕报警”,或是自信“能摆平这事”,或是自以为有钱,不在乎罚那几个钱。可“脸面”的事,不是钱的事——一来,“委屈奖”未必安抚得了环卫女工受伤的心,她们更需要来自公众的尊重与认可;二来,让打人者长记性,还得想想其他让其“丢脸面”、“栽跟头”的办法,比如,舆论的谴责与压力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

□李法明/图 如意/文

### 6 国说

## 当我们跑马拉松时,我们在谈论雾霾

□舒圣祥

2014年北京马拉松于10月19日上午鸣枪开跑。当时,北京市的空气质量为严重污染级别。

赛前,组委会提醒所有选手注意天气情况,建议老年选手及有呼吸系统疾病的选手谨慎选择参赛;赛中,既有业余组选手弃赛,也有专业组选手领跑20公里后弃赛。

往届北马,最受关注的一个话题是“屎红墙”。今年,组委会大幅增加了临时厕所,并推出新规禁止“屎红墙”,随时随地溺最高可能被终身禁赛。不过,今年北马照样不缺少话

题——它创造了马拉松历史上第一次有大量选手戴口罩参赛的“纪录”,有的选手还戴上了防毒面具。

因为北马赛事规模庞大,46%的参赛选手来自国外及国内其他地区,组织管理工作涉及方面众多,赛事延期、改期的难度巨大——面对北马雾霾中起跑的质疑,组委会这番解释当然可以理解。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说,在此如重度污染的天气里,是肯定不适宜举行大型户外赛事的。这项已经举行了34届的传统赛事,能否继续下去且发展得更好,真的需要“推动社会对环境的思考,共同期待

蓝天下的奔跑”。

美国作家卡佛有篇小说题为《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将其借用来做自己的书名《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在今年的北马,如果套用这个句式,显然不会是一个问句,因为答案是确定无疑的:当我们跑马拉松时,我们在谈论雾霾。

让北马成为谈论雾霾的一件赛事,固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我们无法回避。

群众性和参与性是北马这种大型体育赛事的最大特点,参赛名额在短短几小时之内被一抢而空,以至于今年都采取了“抽签摇

## 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 新中国成就档案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香港和澳门问题是殖民主义国家侵略中国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充分考虑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历史与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一国两制”构想首先被运用解决香港问题。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向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经过中英两国政府历时两年的正式谈判,1984年12月19日,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随后,经过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一系列工作,香港回归的各项准备陆续完成。1997年7月1日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香港升起,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怀抱。

(上接第1版)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已成国际设计师的试验场。

——短命。近日,广州市耗资8亿元建成的陈家祠广场,仅使用4年时间,即因为城市建设需要“推倒重来”。类似的短命建筑在各地不断上演:2005年,耗资4000万元建成的重庆渝西会展中心仅仅投入使用5年,因在原址上修五星级酒店被拆;2014年8月,投资2.7亿元的云南省河口的“边境明珠”在完工3年后被拆。

当下国内建筑设计领域求高、求大、求洋,求怪、求奢华的设计之风,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失衡”。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表示,这样的建筑,已经被异化成为一个满足功利需要的超尺度装置艺术,成为“欲望指南针”和“虚荣标志”。

建筑之外,城市公共建筑首先附加了当地官员的个人喜好与政绩观。深圳一个人行

## 有多少奇怪建筑是“权势地标”?

十年的建筑设计师告诉记者,建筑设计行业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外行指导内行”。设计师从专业角度做了很多计算和设计,设计图拿到行政领导那里,对方就说在欧洲的时候看过某个建筑,很大气,要照着那个建。“有时候甚至是人家有一条河,我们人造也要在建筑中凿出一条河来。”

山寨建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地方政府比低的文化修养,盲目崇拜外国的古典主义建筑。但是,这些人并没有了解到外国建筑史是如何发展的,对我国自己的建筑历史发展也缺乏了解。”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教授汤国华说。

因为广州中新知识城规划的挫折,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称自己在广州遇到了“规划之神”——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地方规划部门虽然人员组成专业,但更高一级的规

划委员会由党政领导主持。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说,一些地方领导把自己当成城市“总规划师”,真懂规划的专业人员反倒成了画图工具。

一些城市政府甚至要求建筑设计“一定要惊世骇俗”,以博得关注。“炒热”经济,“哪怕被骂也行”。西南地区某设计院的一个城市规划师告诉记者,当地建设一个“城市环球中心”,就在外形上追求“世界最大单体建筑”,盖得像航站楼。

防规划设计“家长制”权力之手莫再伸

要避免“设计沦为权力的奴隶”,袁奇峰说,城市规划就必须科学、民主,不能谁官大谁说了算。在规划过程中要充分论证,让专业人士的意见真正得到体现。防止规划设计

的“家长制”。

一些官员口中流行的“我的城市”“我的GDP”“我的财政收入”现象,实际上是把主政的一方当作自己的私产,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说,一个城市的整体建筑风貌和设计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必须确保规划设计的权威,不能换一届领导就换一套思路,这样才能保持整个设计的延续性,也能避免一些突兀的奇奇怪怪建筑的出现。

汤国华说,奇奇怪怪建筑的出现反映出奇奇怪怪的心理。我们回看一些历史建筑,其实就是把传统的东西和国外现代的东西结合起来得很好的建筑,是很多中国设计师留学回国后将国外的现代建筑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所形成的建筑风格,无论从建筑和审美角度都是一场大革命。今天,我们急需来一场去权化、回归建筑本身的复兴运动。

(新华社广州10月20日电)

## 全国首届城镇排水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举行

本报郑州10月20日电(记者余嘉熙 冯国鑫 通讯员曹国辉)10月17日,来自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8支代表队共140名选手和排水界的专家齐聚郑州,开展为期3天的首届“排水杯”全国城镇排水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竞技的目的是提高行业水平,推动行业的发展。”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小岗介绍说,本次大赛属于国家类二级竞赛,是全国排水行业首次举办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规则最严的职业技能大赛。

经过激烈角逐,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代表队获总团体成绩一等奖,河南省代表

队获污水处理团体成绩一等奖,江苏省代表队获污水化学监测团体成绩一等奖。来自河南省的和笑天取得污水处理工决赛第一名,江苏省的陈召则取得污水化学监测工决赛第一名。

根据财政部的统计,近8年来,我国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已经接近3万亿元。而与此相对的是,学术成果和技术创新并不尽如人意。在基础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领域,我国和世界科技强国差距明显:目前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不到科研支出的5%,远低于创新型国家15%以上的比例。不用说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等国际重要科研奖项屡屡失之交臂,即便是写出了数量不少论文的科研成果,其质量也不容乐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统计显示,我国每篇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平均6.92次,而这一数据的世界平均值为10.69次。

面对触目惊心的科研经费贪腐案例,不少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认为,一方面是科研经费在监管上存在漏洞,另一方面则是体制滞后迫使科研人员不得不违规操作。

浙江大学一名教授说,学校对科研资金的管理态度,基本上是谁搞到的资金由谁负责。

那么,巨额的科研经费是如何通过层层审计监管,最终被人贪腐流失的呢?记者对近期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梳理:

虚列劳务费用——2010年9月至2011年6月,曾任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院长的宋茂强在担任北京邮电大学“面向新型网络应用模式的网络化操作系统”子课题的团队负责人期间,利用审批和分配科研资金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以虚列劳务人员名单的方式,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央财政资金68万元被私吞,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收集发票冲账——原山东财政学院“微山湖旅游规划”和“傅村镇旅游规划研究”课题组,以差旅费名义37次报销各地到佳木斯的单程火车票1505张,金额28.36万元,占2008年至2011年该项目拨款总额47.75%。

借壳套现——原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利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苕溪课题”总负责人的职务便利,采用编制虚假预算、虚假发票冲账,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国拨科研经费90余万元冲销,划拨到自己实际控制的“壳公司”账户上。

面对触目惊心的科研经费贪腐案例,不少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认为,一方面是科研经费在监管上存在漏洞,另一方面则是体制滞后迫使科研人员不得不违规操作。

浙江大学一名教授说,学校对科研资金的管理态度,基本上是谁搞到的资金由谁负责。

拿到科研资金之后,学校提取一部分管理费,剩下的基本上就是科研项目负责人说了算。

至于科研资金怎么花,虽然也有规定,但这些规定基本形同虚设。比如,这位教授说,他曾做试验需要用到一种压缩机,因为一些特殊的要求,只能找厂家进行特殊改造,费用4万多元,比普通的价格高4倍。去报账不能过关,最后只好另外找一些发票才解决。

政府放手具体项目管理,杜绝“跑部进企”

“科研经费腐败频发,跟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有关。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行政权力直接控制了科研操作,缺少专业的评估机制。在课题来源上,存在着严重错位,没有权力的科研人员拿不到经费,为了拿到经费只好采取贿赂等方式,整个行业完全被扭曲。

&lt;p